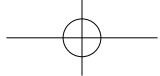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语言与国际社会



语言作为主权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工具，受制于维护和扩大主权国家的利益需要。外交言语活动并非是为了击倒对方，而是在合理的、体面的空间内，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主权国家间外交关系起始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份经过 200 名代表“精心的文字打磨”的，在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文件。代表们之所以克服重重障碍，对该和约反复字斟句酌，除了要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外，也表达了国际社会在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后痛定思痛，力避战争重现的心得。

上图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仪式——画家杰拉德·泰尔博赫通过画笔记录下了 1648 年发生在谈判地点明斯特的重要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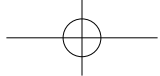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出语言，并借助语言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国际社会而言，语言是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一种反映，语言的使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对构建国际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语言对于国际社会具有建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延伸和代表，在国际社会中，实力霸权和语言霸权往往相伴相行。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实力霸权常常借助国际政治支配力获得语言霸权，其语言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性的主导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就是一种权力。在具体外交活动中，对于语言的理解与运用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外交实践。“文字游戏”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部分，对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不当，往往带来严重的外交后果，甚至导致国家利益的丧失。因此，语言的运用必然成为从事外交活动的外交人员一门必修的课程。

一、语言塑造国际社会

语言不仅对于人类社会有着建构作用，从广义范围来看，对于国际社会的建构也有很大影响¹，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重要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逐渐将语言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当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学术界风头正盛，原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正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人们开始从其他所谓非主流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学界对语言的关注便开始于这个时期。建构主义学派把语言作为影响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影响因素，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语言对建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语言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规则的角度进行研究。建构主义认为，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规则的行为。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往往遵循一定的约定俗成，而这一语言使用过程最终则会演绎成社会的规则，进而各式各样不同的规则最终形成了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所以，只要有语言规则的存在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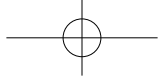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1 刘永涛. 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7）：157.



衍生出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国内社会如此，国际社会也一样如此。第二，从语言使用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的使用可以称得上是一门学问，或者是一门艺术。第三，从话语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被学界公认为可以建构定义和概念，因而可以建构话语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对于语言的特定使用将形成一种主导的话语体系。而一旦某个主导话语体系建立起来，便会形成一种权威，即被当然地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正确的，而任何偏离主导话语的语言均被认为是错误的。第四，从语言权力的角度进行研究。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对于某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和物质力量一样，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同样也形成一种叙述结构，制约行为体的行为，最终影响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

以上研究表明，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语言对国际社会建构发挥重要作用。举例来说，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容一个相同的客观事物，将会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使用不同的语言会演绎出不同的规则，进而形成不同的话语权体系和主导权威。学术研究表明，对于国际关系中语言的使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研究结果也十分有趣。

在当今世界，对于同一问题因利益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表述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针对全球出现的气候问题，对于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词汇来定义这一问题就引起过争议。在美国政府发布的有关国情咨文中，前副总统戈尔使用“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一词；而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则使用“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进行描述。一些亚洲国家政府通常使用“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而欧洲国家往往使用“气候混乱”（climate chaos）进行描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描述将演绎不同的定义和界定，从而带来不同的外交后果。就“气候危机”和“气候混乱”这两个词而言，前者显然加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需要采取紧迫措施来处理而后者则重点强调失序，相对而言紧迫性弱些；“气候变化”一词给人直观感受是这个问题仍然可以被控制，对人类没有太大的挑战；“全球变暖”更容易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在全球平均温度，而不是专注于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海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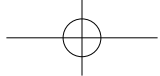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洪水和干旱。最后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保守的说法，即“气候变化”一词，并延续至今。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话语体系¹，为此首先要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现如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依然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圭臬，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行为体行为的描述及各类概念的定义基本上使用西方的话语和意义体系。在这一情势下，中国的很多外交行为常常被西方的话语体系所界定，其结果往往对中国不利。例如，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被西方形容为“中国威胁”，而中国对非洲的战略投资则被西方定义为“新殖民主义”。正因为世界主要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西方国家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界定西方自身和其他行为体的行为。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态势，如今“软实力”这一概念备受学者和政治家关注。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更是明确地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升级版——“巧实力”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社会话语权则越来越被判定为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准。对中国来说，如何构筑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影响力是国家软实力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想要为自身未来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需要在国际话语建构问题的研究上下大力气。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反映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体现中国价值观的国际话语体系，以适应自身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的检讨和反思。这一现象折射出西方人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即其话语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现实的国际社会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很大的伸展和提升。近些年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了很多概念，如“和谐世

1 刘永涛. 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2）：25.



界”“科学发展观”，乃至“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需要将自己的发展理念打造成世界范围内的通行概念，即建立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话语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需要找到中国话语系统与西方话语系统之间的差距，如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然后找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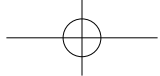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同时，在话语权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正确处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语言实际效果的强弱取决于语言资源的强弱，而语言资源包括媒体资源、语言的通行程度、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现实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和伊拉克都在舆论战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最终的语言效果天差地别。伊拉克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微乎其微，仅仅依靠半岛电视台等少数阿拉伯媒体资源进行发声。而美国不仅垄断了国际社会的主要媒体资源，其国家语言英语更是对阿拉伯语的受众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即便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性战争，但却通过各种舆论手段在将伊拉克政权界定为邪恶政权的同时，把这场侵略战争描述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战争，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

二、世界性的语言彰显国际秩序

“国运兴，则语言兴，国运衰，则语言衰”。历史上一个个案例表明，一个世界性或者地区性的领导国家的语言，必定是国际社会流行的语言。作为软实力的一种，语言的发展以硬实力作为基础。纵观世界历史不难发现，语言的兴衰与国家霸权的兴衰相同步。¹

在古罗马时代，得益于罗马帝国的强盛，欧洲各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罗马帝国覆灭后，由于基督教会作为重要势力继续使用拉丁语，欧洲各国依然以拉丁语为其外交工作语言。在文艺复兴开始以后，随着各国家民族意识崛起，许多国家纷纷使用本民族语言来代替拉丁语，但在数百年的影

1 孙吉胜. 国际关系中语言与意义的建构——伊拉克战争解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5):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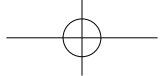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响下，拉丁语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人们在文学、教育、科学等领域使用的主要语言依然使用拉丁语。著名科学家牛顿、培根等人的著作和发明均用拉丁语来书写。在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时，欧洲各国依旧使用拉丁语编写条约。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随着法国称雄欧洲大陆，法语逐渐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国家的外交工作语言。当时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均以讲法语为风尚。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荷兰等国加入了争霸世界的行列，法语渐渐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语的传播达到顶峰，此后，法语的地位逐渐下降。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带来巨大破坏，波旁王朝复辟后的法国再也没有往日雄风。及至 19 世纪大不列颠帝国霸权的开始，英语逐渐出现取代法语成为世界性语言的势头。随着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英语也在全世界范围推广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语特别是美式英语伴随着美国在全球的崛起逐渐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比较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语言，英语的使用范围和地域更为广阔。据统计，当时世界上的报刊有二分之一、邮件有四分之三、新闻广播有五分之三都使用英语。而英语中的科技词汇则成为国际通用的术语和标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坐上了世界头把交椅。凭借自身拥有的巨大经济、军事势力，美国开始将美式民主、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推广到全球，进而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

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在信息时代，信息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和重要。而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其重要作用也就凸显出来。对年轻人而言，为了跟上信息革命的脚步，为了获得最尖端的知识，甚至为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英语是必备工具。无数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因此把英语作为自己的重要功课。在中国，英语成为重要的考试科目，升学、就业等都要求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这些升学和就业的规定无疑直接提升了英语在世界非英语国家的影响力。借助于英语在世界范围的“横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蔓延到世界各个国家，对这个星球上的



许多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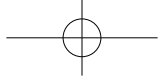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语言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是其所代表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反映。无论是当年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当时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如今“一超独霸”的美国，无一不是凭借其在某一时期强大的硬实力，从而使其国家的语言成为当世通用的国际语言；而他们语言影响力的扩大，又反过来成为承载其文化价值的利器，大大增强了其国家的软权力，从而更间接地提升了其硬实力。

三、国家语言影响国家外交活动

由于使用语言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对同一外交文本内容的理解也会存在着差异，各国对于同一外交文本内容的翻译也不尽相同，有时会南辕北辙。历史上由于各国语言的差异，影响国家的外交行动，甚至影响国家命运的案例比比皆是。

清政府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由于中文和英文的差异，导致本来条约中没有丧失的权益，也因为翻译的不同而被迫丧失。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思维和理解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司法审判权等方面丧失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关税权利方面，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据此，清政府的权利就仅仅是制定一部所谓“公平”的关税。尽管清政府拥有完全的制定权和公布权，即法律条文规定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作为《虎门条约》一个部分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却将26类160余种货物税率用“中英协议”的方式确立下来，清政府也就因此承担了相应条约义务。也就是说，虽然制定关税是清朝政府自己的事，但涉及具体的货物，税率得两国商量着来。因此，事实上清政府改变税率的权力丧失了。负责外交谈判的清朝官员被条约开头的几句官话糊弄住了，大笔一挥爽快地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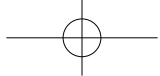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订了条约，却稀里糊涂地让中国失去了近一个世纪的关税自主权。

在司法审判权方面，《虎门条约》第六款明确记载：“倘有英人违背此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理，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这原本是根据清朝的要求写入条约的，本意是禁止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结果变成违禁英人的处治权归英国。¹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伤害”的表述，使这项原本由英方担保禁止英人前往中国大陆腹地的条令，变成清政府保证违反禁令的英国人不受伤害的承诺，其条约内容的实际意义大变。这样一个失误使中国丧失了对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这项重要的权利。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及综合实力存在着差异，其外交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历史悠久，其语言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闭关锁国的清朝，难以接受他国语言文化思维，难免在外事活动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进而对国家的外交间接地产生影响。清政府在与他国签订条约时，对于条约中的内容只是从自己的语言定义出发，按自己的语言含义和表述习惯来理解国际条约，这便和实际语义产生极大的出入。从这一时期外交实践来看，清政府面对大英帝国不仅没有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也缺少专业外交和英语人才，更别说还有“天朝上国”封建思想的作祟。因此，即便在条约文本中千篇一律地用着看似详尽、避免事端的语言，但事实上却是模棱两可、存在多方面歧义，最终导致自身利益的损伤。

2001年4月1日，美方派出EP-3侦察机飞到中国沿海实行抵近侦察，对此中国军方派出军机对美机进行跟踪监视。在飞行过程中，美方飞机突然违反飞行规则转向中国军机，导致中美军机相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方侦察机事后在未得到中国允许的情况下，闯入中国领空迫降在中国的海南机场。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美国一直借助自己的话

1 程英姿. 从《南京条约》看中西体制和观念的碰撞——中国近代化必要性的案例分析 [J]. 太平洋学报, 2008, (8):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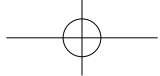
语建构自己的正面国际形象, 逃避责任, 尤其是美国政府用了似是而非的所谓“深表歉意”的语句代替了应该表示道歉的表达。

在相关的外交谈判中, 由于中国要求美国必须作出道歉, 美国外交话语逐渐向低姿态转变, 并采取适当的措辞来表达对中国的歉意。《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4月7日报道分析称, 北京坚持美国应该向中国道歉, 目的是让美国承认此事件中自身的过失责任。¹ 因此,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道歉”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美国媒体和舆论普遍表示, 如果共和党政府选择“道歉”一词, 那就意味着不仅是美国承认自己的错误, 将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威信, 并对布什政府的中期选举以及连任产生不良后果。美国政府心里也很明白, “道歉”不仅仅意味着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同时将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一旦美国向中国“道歉”便给中国以口实, 使得中国可以借机审判美国飞行员、进行赔偿、要求美国结束对中国的抵近侦察。4月11日, 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美国政府致中国的外交信件。信中表示: “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方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已表示了真诚的遗憾。请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王伟的家属转达, 对飞行员王伟的失踪和那架飞机的坠毁, 我们深表歉意。”信中所用的语句是: 对此次不幸事件表示“遗憾”(regret), 对中国飞行员王伟的家属表示“哀痛”(sorrow), 信中还两次使用了“深表歉意”(very sorry)。

就外交学而言, “遗憾”和“道歉”两词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单从语义表达上分析, 英语中 regret (遗憾) 和 apologize (道歉) 有差别, 在汉语中也有差别。其差别的程度以及表达的态度则取决于特定语境中言者的本意和听者的理解, 在某些情境下语义可能很相近, 也可能差别很大。在外交语言使用中, “遗憾”和“道歉”则蕴含着不同的政治含意², 最大的区别是“道歉”有承认错误的意味, 而“遗憾”没有。在英语中, 如果用“apologize”, 除了表示歉意, 还有“认错”(admitting fault)之意, 美方不

1 何芳. 语言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作用[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154.

2 贺文睿. 模糊性外交语言的翻译原则与策略[D]. 信阳师范学院, 2015: 24.



接受这一说法；而“遗憾”的英文“regret”有抱歉的含意，但没有承认错误的意味，对此中国难以接受。该事件的最后解决办法是，美国在声明中，除了使用“遗憾”一词，还以“不幸”（unfortunate）和“悲剧”（tragic）等词叙述事件，以委婉地表达歉意。另外，美方使用了含义介于“apologize”和“regret”之间的“very sorry”来表达歉意，既保住了美国的面子，同时给了中国一个台阶。¹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交往基石是国家的硬实力。在中美撞机事件之前，也发生过美国军舰撞沉日本渔船的事件，美国政府也没有表达过所谓的“道歉”。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使用“very sorry”来表达对事件的态度，已经算作对中国国力的承认和事实道歉。

主权国家的对外语言实践表明，语言不仅塑造着国际社会，书写着国际秩序，在国家的外交实践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软实力”说法流行之际，语言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更是成为影响国家实力与地位的重要因素。同样，语言作为一种对外交往工具，是沟通国家间外交关系的桥梁。不同语言对于同一外交事件的不同表达，往往成为影响国家间交往，甚至影响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其语言必定是国际社会流行的语言；而一种语言的兴盛，必定是以该母语国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来支撑的，这铁一般的定律已被无数历史事实鉴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之际，如何在世界范围扩大中文的国际影响，并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1 高睿. 论政治外交语言中模糊策略的语言与语用实现形式 [D].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79.